

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

宋明帝刘彧传

刘国石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【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】

宋明帝刘彧传

● 刘国石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01号

宋明帝刘彧传

刘国石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231000字
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5,200

ISBN7—206—02730—X
K·69 定价 14.50元

毛泽东评宋明帝刘彧

△刘彧据建康，四方皆反。内线作战，以寡对众，以弱敌强，以慕容宗为谋主。以刘休若、刘休祐、刘休仁、吴喜、任农夫、张永、萧道成、王道隆、刘劭、沈攸之、黄回、吴安国、张兴世、刘嗣祖诸人为将帅，终于全胜，可谓奇矣。

毛泽东对历代帝王的评说

(代总序)

在毛泽东心目中，一部《二十四史》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。

作为革命家，他不相信这些，反感之极。

作为历史家，他孜孜不倦地阅读、体会。

作为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更乐于从中寻求历史演变的成败得失。

于是，就有了关于历代帝王的评说。

1. “很有本事、能文能武的人”——商纣王 帝辛

商纣王历来被认为是昏淫无道的暴君典型，直观的依据是：商朝在他手里亡了国。

毛泽东不这样看。他几次谈到这个问题。

1958年11月读斯大林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的谈话中，说到商品生产时，他顺势发挥：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？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，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。把纣王、秦始皇、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，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、能文能武的人。他经营东南，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，在历史上是有功的。纣王伐徐州之夷，打了胜仗，但损失很大，俘虏太多，消化不了，周武王乘虚进攻，大批俘虏倒戈，结果商朝亡了国。史

书说：周武王伐纣，“血流漂杵”，这是夸张的说法。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，他说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。”

1959年2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，毛泽东又说：龙山文化很有名啊！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，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。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，所以以后失败了。

为商纣王平反，当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。有名的翻案文章，较早见于郭沫若的《驳〈说儒〉》。毛泽东是赞同他的观点的。

郭沫若认为，帝辛（商纣王）“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万恶无道，伊然人世间的混世魔王，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。”“像商纣王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。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，便是经营东南，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。这件事，在我看来，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，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。这件事，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，才渐渐的重见了天日。”“帝辛的经营东南，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。你看古本《泰誓》说：‘纣王有亿兆夷人亦（大）有离德，余有司（旧作乱）臣十人同心同德’（见《左传》昭二十四年），这亿兆的‘夷人’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。俘虏有亿兆之多，可见商的兵士损耗亦必不少。兵力损耗了，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，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，牧野一战便弄到‘前徒倒戈’。那并不是商人出了汉奸，而是俘虏兵掉头了。”

就纣王个人而言，诚如郭沫若所说，周朝以降的史书，视之为“万恶无道”的人。其源，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，即《尚书》中的《泰誓》、《牧誓》。如后者说：“今商纣王唯妇人言是用，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，昏弃其家国；遗其王父母弟不用，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，俾暴虐于百姓，以奸究于商国。”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

传。故郭沫若在《驳〈说儒〉》中说后人是“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”。毛泽东也指出是“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”。在毛泽东看来，商纣王是“能文能武”、“很有本事”的人。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。《荀子·非相篇》便说纣王“长巨姣美，天下之杰也；筋力超劲，百人之敌也”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也说：“商纣资辨捷疾，闻见甚敏；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。”这些，都是很寻常的材料，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。对纣王失败的教训，毛泽东总结的是，征伐东南，所得“俘虏太多，消化不了”，“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”，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，倒戈起来。据《尚书·武成》载，周武王伐纣，与商朝的军队“会于牧野，罔有敌于我师，前徒倒戈，攻于后以北，血流漂杵”。意即杀人太多，血流把捣东西的棒槌都漂了起来。纣王亡国自杀，在郭沫若看来，仍不失是位英雄。在《驳〈说儒〉》里，郭沫若引《左传》里“纣克东夷而殒其身”诸句，说“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，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，……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，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？”

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，会是心有同感的。

评价历史人物，主要看他的大面，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，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方法。所以，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，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，为他们翻案。

2. 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——秦始皇嬴正

秦始皇是毛泽东谈论得较多的一位帝王，并且常常透露出他的一些实践选择信息。

儒与法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。二者的主要分歧，是重礼治还是重法治，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，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，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。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，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，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。几千年来，有建树的政治家、思想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、法问题，免不了要做出扬此抑彼的评价。

可以说，“秦始皇”和“孔夫子”，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两个盘根错节的“情结”，交替使用的文武之道。

毛泽东亦然。他经常对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，透露出他的选择。

他说：他从小就读孔夫子的书，当时背得，可是不懂。

他说：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，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。我是赞成秦始皇的。

他说：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，孔夫子是革命党，他到哪儿，哪里就造反。

他说：祖龙魂死秦犹在，孔学名高实秕糠。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。

他说：要采用孔子的教学方法。

……

50年代末开始，毛泽东的评价重心发生了转移。

1958年5月8日下午5点。北京，中南海怀仁堂。为“大跃进”推波助澜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。人们屏息聆听着毛泽东那不拘一格的新颖讲话——破除迷信。

说着说着，毛泽东岔开了话题：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，我看了很高兴，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，引了司马迁、司马光，可惜没有引秦始皇。秦始

皇主张“嗜古非今者杀全家”，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。

看来，秦始皇引起毛泽东兴趣的，除了他的功业外，还有他敢于否定传统，敢于蔑视被人们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“先王”，也是一个方面。其实，要干点前人没有干过的事，就不能太尊重陈规，这是必然之事。而毛泽东不也是觉得他和他领导的党正干着空前的事业么？

一旁的林彪，在这种场合本来是很少即兴说话的，前段时期，他主要是在养病。但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，他竟忍不住插话：“秦始皇焚书坑儒。”

毛泽东对“焚书坑儒”这个话题很敏感。建国后，不少民主人士曾就此话题暗示过共产党的一些做法。毛泽东反复同他们表白过自己的立场。一次，他对章士钊说：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，不对，超过一百倍。

的确，秦始皇的声誉在过去是一直不大好的，毛泽东要重新评价秦始皇。

在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前，2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毛泽东便就如何评价秦始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，他说：一股风一来，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，可以说成不好的；本来是基本上一个人好的人，可以说他是坏人。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，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。搞了两千多年，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，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，秦始皇又有名誉了。但是，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，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。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，有三个指头。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。一个古人，几千年评价不下来，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，同志们可以想一想。毛泽东的这些话，是个性化的，有要做翻案文章的味道，但毛泽东视之为“教训”，让人们“想一想”，却不乏深意。

林彪可能没有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。否则，以他的性格，是会好好的“想一想”，不会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贸然插话“秦始皇焚书坑儒”的。

毛泽东眯了林彪一眼。他就是这样的性格，认准了的，你越反对，他越坚持，特别是他的威望开始达到顶峰的时候。接着，索性把话挑明：秦始皇算什么？他只坑了460个儒。我与人辩论过，说我们是“秦始皇”，我们一概承认。可惜的是，他们说的不够，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。

一番话，说得人们哄堂大笑，也说得林彪一脸尴尬。

林彪是固执的。这个不起眼的插曲，为后来他儿子主持炮制的《五七一工程纪要》中的一个提法，埋下了一个伏笔。

或许是爱屋及乌吧，毛泽东对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出过大力气的李斯评价也很高，乃至不愿意视他为出于孔儒门下，为他的老师荀子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称——“儒家的左派”。

战国末年，楚国上蔡人李斯投奔秦国。他原为荀子的学生，入秦后任为客卿。公元前237年，因韩国使郑国利用建造溉渠离间在秦国做事的客卿，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（即后来的秦始皇），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，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，要求把他们赶走。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，下令逐客。于是李斯作《谏逐客书》，首先历数秦穆公以来，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，足见用人唯人，不必限于本土。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，虽不产于秦，而秦用之，以其与异国人材相比：按之以事理，说之以利害，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驱才资敌。

毛泽东时常读这篇文章，给予高度评价。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《政治经济学（教科书）》的谈话中说：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，有很大的说服力。那时候各国的关系，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、武士，一

个国家不统一。由称赞李斯的文章进而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内部统一程度很低的情况，大概是为了肯定李斯所主张的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。

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，毛泽东还说：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，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，主张法后王。后王就是齐桓公、晋文公，秦始皇也算。

由此可知，毛泽东称道李斯进而及于荀子，是与他晚年扬法抑儒、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有关联的。在1965年6月13日接见胡志明的谈话中，他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明确，他说：孔孟是唯心主义，荀子是唯物主义，是儒家的左派。孔子代表奴隶主、贵族。荀子代表地主阶级。又说：在中国历史上，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，孔子只说空话。几千年来，形式上是孔夫子，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。秦始皇用李斯，李斯是法家，是荀子的学生。

荀子是“儒家的左派”，这是很有意思的评断。毛泽东从哲学观、阶级立场对荀子和孔孟思想作了区分，荀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，便合乎逻辑了。秦始皇用李斯，而法家是办实事的，这是毛泽东推崇李斯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到60年代中期，毛泽东对孔夫子越来越反感，对秦始皇的功业越来越称赞。1964年，他经常谈到对两人的评价。

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，他说：孔夫子有些好处，但也不是很好的。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。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。孔夫子是讲空话的。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。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，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、中国各种制度，如度量衡，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。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。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。

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，他说：孔夫子

讲“仁者爱人”。爱什么人？所有的人？没那么回事？爱剥削者？也不完全，只剥削者的一部分。不然，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？人家不要他。他爱他们，要他们团结。可是闹到绝粮，“君子固穷”，几乎送了一条命，匡人要杀他。

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，他又发挥道：齐桓公九合诸侯，订立五项条约，其中有水利一条，行不通。秦始皇统一中国，才行得通。秦始皇是个好皇帝，焚书坑儒，实际上坑了460人，是孟夫子那一派的。其实也没有坑光，叔孙通就没被杀么。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，厚古薄今，反对秦始皇；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，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毛泽东批孔扬秦，找到了一个靶子，这就是郭沫若的《十批判书》，尽管50年代他还引用过书中说孔子是革命党的观点。

郭沫若的《十批判书》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。“孔墨的批判”、“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”分别是其中的第二篇和第十篇。首篇是“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”，其余七篇依次为关于儒家八派、稷下黄老学派、庄子、荀子、名辩思潮、前期法家、韩非子的“批判”。所谓批判，当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之意。

书中《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》一篇，是这样说秦始皇的：“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……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，自然有他的理由：因为他们在一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……”

“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，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，零落了下来……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。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以后，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，又整个化为了奴隶。”

“因此，秦始皇时代，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。由奴隶制言，可以比为回光返照。”

郭沫若还在“后记”中说：“韩非的文章如《五蠹》、《显学》之类，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，读起来很不愉快。”此外，该书对“五四”以后受到重视的墨家思想的批判也很严厉。这些看法，正如“后记”所说：“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。”于是有人认为作者“袒护儒家”，担心“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”。对此，作者在1954年出版改排本之前写的《改版书后》中有一个说明，他说：“我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，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，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，那可不是我的本意。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，但它的作用早已变质，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。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，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，珍惜恐龙的化石，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，但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？……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‘新儒家’的迷执，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——蜥蜴之伦的残梦。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以后，在谈话中，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《十批判书》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，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。

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，毛泽东当面说：拥护孔夫子的，我们在座的有郭老，范老也是基本上有点崇孔呀，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呀。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呀。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，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。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、旧贵族，我偏向这一方面，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。因此，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。你这个《十批判书》崇儒反法，在

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。但是，在范老的书上，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。就是申不害、韩非这一派，还有商鞅、李斯、荀卿传下来的。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这一套呵。

这次中央全会作出了开除刘少奇党籍，定性为“叛徒、工贼、内奸”、“修正主义者”的重要决定。毛泽东评说孔夫子和秦始皇，认为孔夫子代表奴隶主、旧贵族，是否别有所指，则不得而知了。

毛泽东称道秦始皇，似乎还包含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民族感情。1970年6月19日，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，林彪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场。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道：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，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——秦始皇。中国这个字有两说：一个叫瓷器，没有A字，就是CHIN（秦朝）。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。人家骂他可骂得厉害。

林彪心里，似乎始终没有改变对秦始皇的看法。

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，揭开了林彪集团走向覆灭的序幕。陈伯达、叶群搞天才论，以及设国家主席的喧闹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。出于策略考虑，他还没有扯上林彪。

可林彪坐立不安了。又过了半年，1971年3月下旬，他儿子林立果炮制的《五七一工程纪要》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：“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。”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，借马列主义之皮，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。”“打倒当代的秦始皇——B—52。”

这里的主语，一看便知。

在短短的纪要里，竟三次把毛泽东比作秦始皇，而且是封建暴君那个侧面的秦始皇。其用心之深，可想而知了。

对林立果来说，这是不是一种“家传”的暗示呢？

无独有偶，“九·一三”事件后，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

一些林彪肯定孔、孟某些言论的材料、条幅、言论，诸如人们后来十分熟悉的“悠悠万事，唯此唯大，克己复礼”之类。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。

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、国务院直属机关的“批林批孔”动员大会上，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。“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，主席说，噢，凡是反动的阶级，主张历史倒退的，都是尊孔反法的，都是反秦始皇的。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，主席让我们，就是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。所以，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，整理了一个初稿，这个稿子只有两三百页，当时只有两三百页，送给了主席，也送给了江青同志……（江青）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。所以这样一来，东西就多了……。后来编了一本（即《林彪与孔孟之道》材料之一），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，主席、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，连封皮标题，就是封面那个标题，前言、内容，一字一句地、不漏地看完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。”

孔夫子和秦始皇，这两位老去千年的一“文”一“武”，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活中，竟成了风云交错的气象坐标，扮演了如此对立的角色。

于是，批林，必须连带批孔；更要肯定秦始皇为代表的法家。

1973年，毛泽东几乎是连珠炮似地向中国人、外国人宣告他批孔扬秦的观点。

5月，江青在毛泽东住处，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《十批判书》大字本。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，并说：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。顺便又念了一首诗：郭老从柳退，不及柳宗元。名曰共产党，崇拜孔二先。诗中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评峻切。不

过毛泽东对他仍是尊重的，称之为“郭老”，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。郭沫若不是党内当权派，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批判他。当然，由于观点不合时宜，郭沫若及其著作跟着倒霉，也是注定的事情。

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指示。

7月4日，毛泽东召见王洪文、张春桥时，又特地谈起：郭老在《十批判书》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，即人民本位主义，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，跟他一样。郭老不仅是尊孔，而且还反法。尊孔反法。国民党也是一样啊！林彪也是啊！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，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。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。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，就说秦始皇不错了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。

可是，古今称赞秦始皇的文字，委实太少，这使毛泽东很不满意。

谈话中，他提起了李白，认为就是李白讲秦始皇，开头一大段是讲他了不起：“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！挥剑决浮云，诸侯尽西来”，一大篇。这里说的是李白《古风》59首之三。

7月17日，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时，毛泽东又说：有人骂我，说我是秦始皇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坑的是一派，只有460多人，他崇尚法家。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，但是他的《十批判书》有错误，是崇儒反法。法家是前进的嘛！我们的社会要发展、要前进。……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。坑儒也不过坑了460人。

8月5日，毛泽东给江青念了自己刚写就的后来题为《读〈封建论〉呈郭老》一诗：

劝君少骂秦始皇，焚坑事业要商量。

祖龙魂死秦犹在，孔学名高实秕糠。

百代都行秦政法，《十批》不是好文章。

熟读唐人《封建论》，莫从子厚返文王。

接着又说：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，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，都是法家。这些人主张法治，犯了法就杀头，主张厚今薄古。儒家满口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。

9月23日，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：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，我也是秦始皇，林彪骂我是秦始皇，中国历来分两派，一派讲秦始皇好，一派讲秦始皇坏。我赞成秦始皇，不赞成孔夫子。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、统一文字，修筑宽广的道路，不搞国中有国，而用集权制，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，几年一换，不用世袭制度。

“马克思加秦始皇”，毛泽东几年前的这句话，是否反映出他晚年的紧迫心态呢？

3. “老粗出人物”——汉高祖刘邦

刘邦以一平民百姓，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，夺得天下，开创几百年的汉朝基业，这在中国夏、商、周以来的历史上，算是第一个人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里，也多次强调他“起微细”，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。如“不事家人生产作业”，对“廷中吏无所不狎侮。好酒及色”等。另一方面，又“仁而爱人，喜施（舍），意豁如也。常有大度”。这些，大体是刘邦出身“细微”而又有不凡的意气抱负的“老粗”本色。毛泽东读史，很注意人物的出身和